

七曲山文昌宫“除毁贼像碑”

孙 华

内容提要 四川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宫又称“大庙”，庙内风洞楼上曾有清初的张献忠塑像，现在还保留着清乾隆年间安洪德撰写的《除毁贼像碑记》石碑。该碑的碑文有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大庙一带的活动、当地人给张献忠塑像、无业游民“咽噜”利用大庙骚扰川陕官道以及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塑像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作者认为，张献忠重修大庙是在他第三次往返梓潼之时，塑造时间是张献忠死后，“咽噜”问题严重发生在清乾隆初年以后，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像是在他就任绵州长官之前。

关键词 张献忠 文昌宫 咽噜 除毁贼像碑 梓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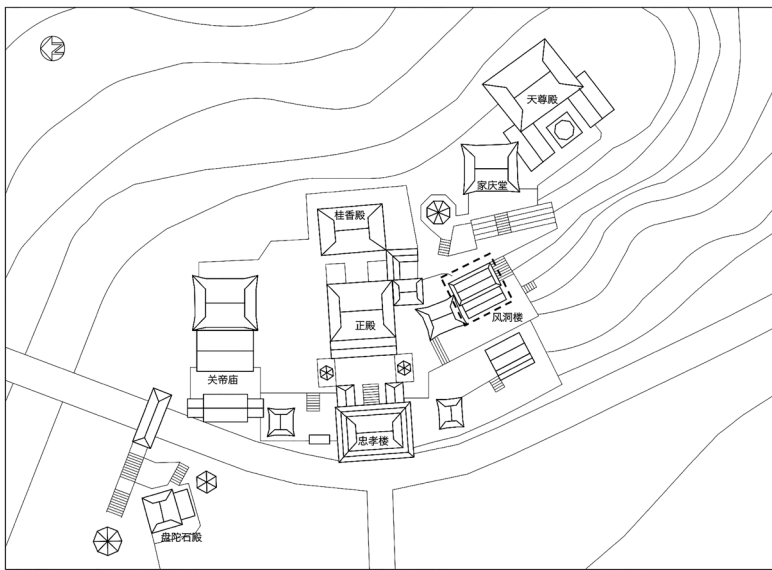
四川梓潼县城北的七曲山文昌宫是文昌帝君的道场。该庙历史悠久，最早本来是祭祀蛇神的场所，后来蛇神逐渐人神化，成为民间俗神之一张亚子的祠庙。唐宋时期，梓潼神张亚子成为整个四川极其膜拜的神祇，连朱熹都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①。作为梓潼神祖庭的梓潼神祠，自然也应相当壮观。宋代以后，文昌逐渐被纳入道教的神仙系统，道教神祇众多，原先专祀梓潼神的祠庙也就成为道教宫观。既然是道教宫观，当然要以道教的至上神元始天尊为最高神祇，将其殿宇安排在七曲山最高峰的山顶上，其下才是祭祀文昌帝君一家的殿宇。到了明末清初，张献忠因文昌帝君与他同姓，将其作为自己的祖先，以神话自己的出身，故梓潼文昌宫又有“大庙”（即“太庙”）之称。按照文左右的布局习惯，张献忠还在文昌宫的中路右侧修建了祭祀关圣帝君的关帝庙，从而基本奠定了七曲山文昌宫现在的格局^②。

七曲山文昌宫现存建筑属于元、明、清三个时期。现存最早的元代建筑仅有川陕驿道（今川陕公路）南侧的磐陀石殿一座，与文昌宫其他明清主体建筑分离。明代以前，文昌宫主体建筑当在磐陀石殿以下的区域。明人所作《文昌祠记》这样描述文昌宫：“文昌灵应祠，在七曲山梓潼县北……从此道入，即忠孝楼，祠中之皋门也。楼累三层，高百尺，自楚黄鹤而下，莫之与京。楼后高歌台，始与楼之二层平。上奉文昌殿，左右安钟鼓，两廊置配享，皆秩秩有序。后为桂香殿，月粟秋漂，一邑浸染，弥月犹腹，是为蜀王府建，岁时焚修无缺。左即风洞景。前为送子圣母殿。……转上重阶，为启元殿。又上为天尊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

② （清）王士禛：《阆蜀余闻》：“献贼乱蜀，追尊梓潼神为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壮缪侯祠于其东，皆极巨丽。献贼尝赋诗于此，使其伪官属严锡命等皆和，立成，稍迟辄杀之。其诗刻石，置祠八卦亭。知县王维坤碎之。”缪文远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十卷，兰州大学出版社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影印，2003年。

〔图一〕七曲山文昌宫总平面图



殿，前为八方台以观天象。由楼北行，亦涉重阶，为盘陀石，有坊曰盘陀仙迹。……再北升，为应梦台，象八卦，中有石床，壁间绘应梦事迹……躐峰顶，为望水亭，而观止已。”^{〔1〕}将七曲山文昌宫现在的布局与明人所记进行对照，除了没有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文昌宫右侧增建的关帝庙，以及清代以后新建或重建的个别偏殿外，文昌宫的基本格局及主要建筑群，在明代晚期就已基本形成。

七曲山文昌宫建筑群除了祭祀道教最高神祇元始天尊的天尊殿，还有奉祀关圣帝君的武庙。祭祀文昌帝君的殿宇由三组建筑构成：一是祭祀文昌帝君的主祠，包括忠孝楼（百尺楼）、文昌殿（正殿及其前面的拜殿）、桂香殿（后殿），还有左右钟鼓楼和廊庑；二是主祠右前方山坡上的凭吊文昌帝君圣迹的殿宇和遗迹，如磐陀石殿、应梦亭、晋柏坊以及望水亭等；三是主祠左侧的祭祀文昌帝君家人及其相关人物的殿宇，包括启元殿（又名家庆堂）、白特（文昌帝君的坐骑）殿、风洞楼等。“除毁贼像碑记”的石碑，就竖立在与文昌帝君相关建筑群第三组建筑的风洞楼上〔图一〕。

风洞楼是祭祀文昌帝君及其眷属的第三组建筑之一，位于该建筑群轴线的后部。楼右侧略前是清代兴建的子母殿，楼后偏左的高处是启元殿，即家庆堂，所在地势高差与文昌主祠相近，但远低于侧后的启元殿。清张邦伸《云栈纪程》卷六记该殿周边环境说，高歌台“左即风洞，毗连子母圣殿。转上重阶为启元殿”^{〔2〕}。清李德淦《蜀道纪游》上卷记载该殿形势说，文昌正殿“左一殿依山，后壁有洞，幽深元邃，或以为可通陕西。龕塑帝君行像，凉笠乘骡，从者草履。再进曰家庆殿，为发祥之地，如圣庙之启圣宫”^{〔3〕}。这种奉祀文昌父母殿堂在上，奉祀文昌殿堂在下，且殿堂后壁利用山体的一个天然山洞，在洞口前塑文昌乘白骡出山的形象，当初的设计就隐含了文昌神出世的寓意。

风洞楼坐西朝东，靠崖而建，上下两层。利用台地高差，上层后檐角柱和山柱立于高台上，前檐的檐柱则下垂至高台下。上层前虚后实，类似山地民居常见的吊脚楼模样。下层面阔三间，进深两间，高度与后面的高台相当，下檐只围绕前面及两侧。上层面阔一间，下层明间的两根檐柱直通上层，与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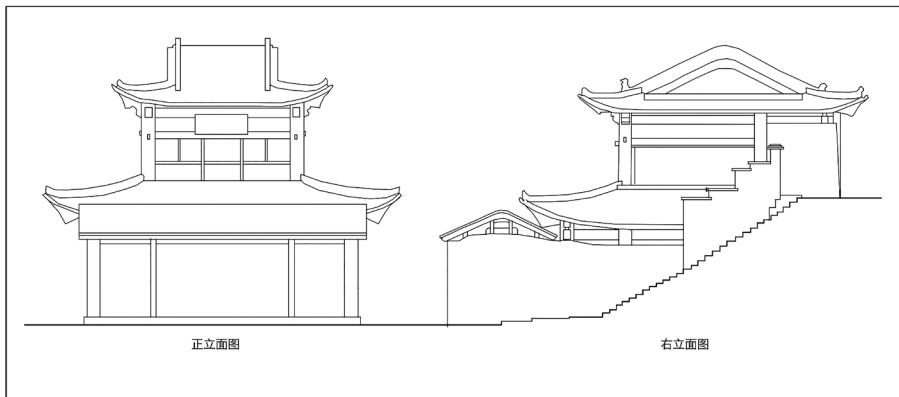
〔1〕 (清)张香海等修、杨曦等纂：《重修梓潼县志》卷四《艺文》，页449—451，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咸丰八年刻本影印，2007年。

〔2〕 (清)张邦伸：《云栈纪程》第三册，页27，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清乾隆五十九年敦彝堂刻本，1979年。

〔3〕 姚乐野、李勇先、胡建强主编：《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第十三册，页199，巴蜀书社影印清道光五年刻本，2014年。

高台上的后檐两根脚柱共同承托檐檁及檁下的额枋。额枋上托八架梁的梁头，梁上用童柱托六架梁，其上再用童柱托四架梁，梁上置驼墩承两檁及卷棚屋顶。屋顶为两山收进甚大的歇山顶。下层没有楼梯通向上层，上楼必须从南外侧旁的石阶前往上层后面的平台，再回头通过后门进入上

〔图二〕风洞楼立面图



层楼内。整座楼阁用材粗大，形态古朴，其年代不会晚于明代中期。楼前的卷棚顶拜厅，用材卑小，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补建⁴¹〔图二〕。

现在的风洞楼内，其下层有当代重塑的文昌骑白骡像，原先的塑像⁴²已在“破四旧”时被毁。上层中央有木构面南的神龛，内塑观音像尚存，该像应该是在张献忠像被毁后另塑，该位置原本应该是张献忠像。1987年重塑的张献忠像，因为原先偏中间的位置已经被观音像神龛占据，故只能在观音龛后壁重塑面北的像，就好像寺庙天王殿倒坐的韦陀护法神像一样。清人陶澍《蜀轶日记》记载，七曲山文昌宫“(家庆)堂之下为风洞，塑神骑白马像。上有楼，旧存张献忠像，绿袍金脸，貌甚恶。乾隆七年为邑令安德洪所碎”⁴³。这段文字反映了清初风洞楼上下原先塑像的情况。“除毁贼像碑”就嵌砌在风洞楼二楼后墙的石壁上，与毁而重塑的张献忠像近距离对峙〔图三〕。

石碑高1.33米、宽0.73米、厚0.1米。碑面镌刻楷体文字，碑题与碑文字体大小基本相同。碑题一行，碑文13行，碑文从右向左竖排，每行34字。碑题与碑文每行首字平齐。尊称上提一二字。其中第1行“梓潼文昌宫”、第12行“尧天舜日”、第13行“大清乾隆”上提二字，第6行“上宪”、第9行“本州宪”上提一字。录文如下(录文用简化字，提行用“J”符表示，原文小字也用小字标出)：

除毁贼像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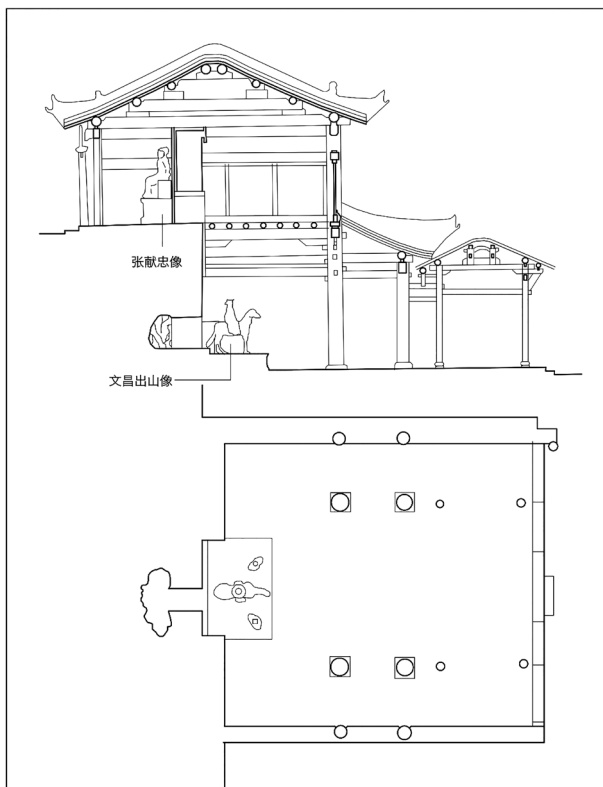
梓潼文昌，忠孝神祇，故千秋禋祀。余洪德，山左人也，来令绵竹。向闻罗江令李公名德瀚者，谓J神祠中有绿袍金脸，乃残贼张献忠像也，每悔其未曾除去，盖因贼杀戮至此，见

〈1〉 风洞楼的始建年代不明，明人的《文昌宫记》已经有风洞楼的记载，可知不会晚于明代晚期。乾隆五十四年(1789)立于风洞楼内的“培修风洞楼碑记”写道：“前署梓潼令将公，广元令童公不期而遇，遂相与循廊庑绕殿……风洞楼中蔓草满前，瓦砾磊积，洞前盈亩之地，几不可以容足下临。……因捐金□□，葺其颓败，易以椽楹，洞前□砌石阑，更建卷棚于楼前。”文中记录了蒋仕椿培修风洞楼的事情。

〈2〉 (清)郭尚先：《使蜀日记》，前揭姚乐野、李勇先、胡建强主编《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第十三册，页319。书中记载：“又东为小殿，奉神出山像，戴圆笠，骑百卫。龛之后有圆洞，高广皆三尺许，云其内甚深广，初春有水出焉，得一勺可以已病，神所祝也。”

〈3〉 (清)陶澍《蜀轶日记》，前揭姚乐野、李勇先、胡建强主编《中国西南地理史料丛刊》第十三册，页262。

〔图三〕风洞楼塑像位置示意图



神家堂」对联有字，适符贼之姓名，故僭冒神族，而不敢杀左右民。民畏而媚之，塑贼于兹，妄亦甚」矣。相衍日久，随昧而不毁，已愚之至矣。复谬为之说曰：此即文昌化像也。又何其侮慢神」祇之极乎！余奉」上宪之委，协平梓潼道路，搜至风洞楼上，见其绿袍金脸、狞恶狼状，大不类神，其为贼像无」疑。思以忠孝神祠，而侧此污秽，实大不敬。乃道之甚不平者，若不速为平除，无怪乎年年」啮嚙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急明于」本州宪杜讳兰，命役万段其像，以正贼大逆不道，毒害生民之罪。更焚而弃之于道路之间，使」往来乘畜践而溺之。以泄人忿，以除淫祀，以净神宇，以正风化。使人人皆知乱臣贼子，残」忍独贼，虽千百年后遗留尸像，犹不免于诛戮，可不猛省而相劝为忠臣孝子，以游于」尧天舜日之中乎？为此晓喻，咸使知闻。

大清乾隆七年岁次壬戌孟春谷旦，署直隶绵州知

州聊城安洪德撰勒石。

“除毁贼像碑”记录有明清之际及清初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碑的关注者不多，只有王代升先生介绍了该碑的基本情况及文昌宫的大致历史，并附有模糊不清的碑文拓片和全部录文，与碑文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却未讨论^{〔1〕}。该碑因置于室内楼上，所以保存较好，字迹清晰，文意晓畅，没有字句上的理解障碍〔图四〕。需要讨论的主要是该碑文字反映的明清之际和清代早期四川的社会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张献忠与七曲山文昌宫、风洞楼张献忠塑像的由来、“啮嚙”与蜀道治安、安洪德毁张献忠像等事。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一 张献忠重修七曲山文昌宫的时间

《除毁贼像碑记》记述了文昌宫张献忠塑像的来由：“盖因贼杀戮至此，见神家堂对联有字，适符贼之姓名，故僭冒神族，而不敢杀左右民。民畏而媚之，塑贼于兹。”碑文中所说的“家堂”是文昌宫家庆堂的简称。家庆堂是奉祀文昌一家的殿堂，位于风洞楼后，原名启元殿。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梓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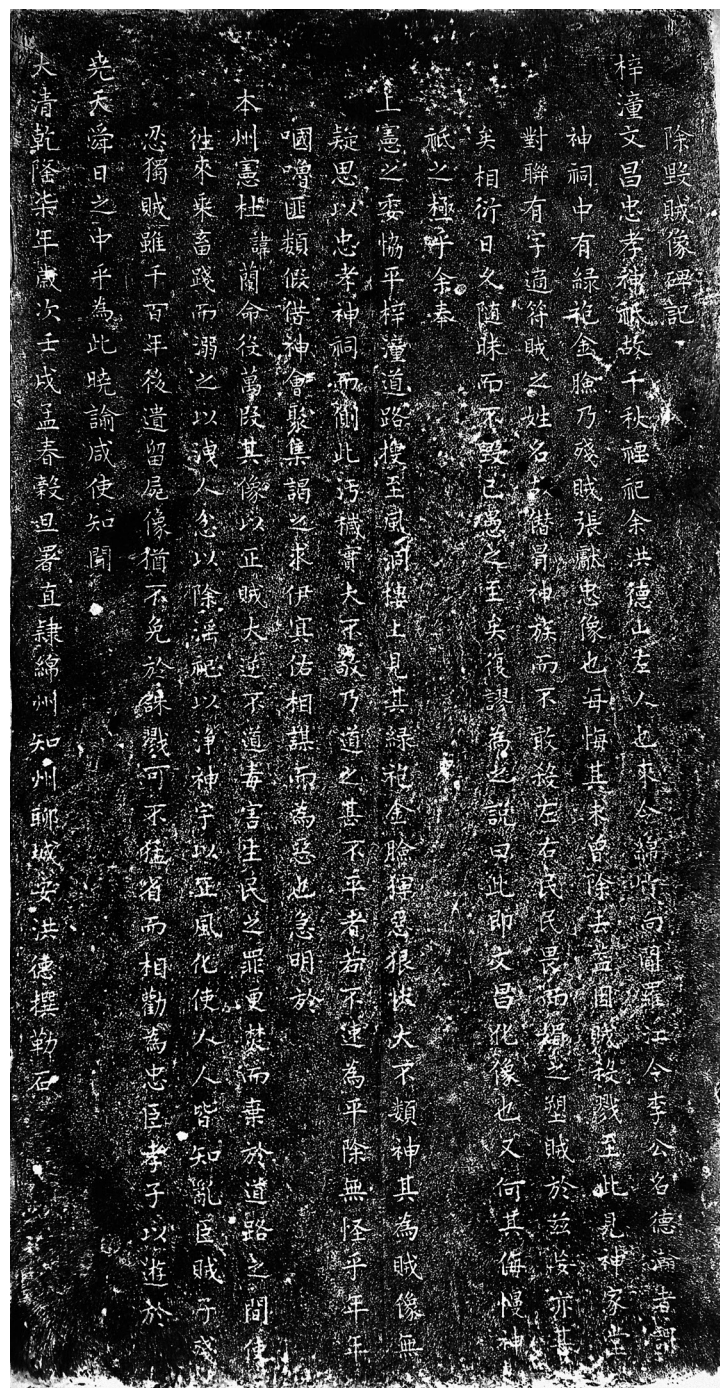
〔1〕 王代升：《张献忠与梓潼大庙》，《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

知县袁还朴培修启元殿，更名为家庆堂。据比较可信的历史文献(如明末清初四川新繁人费密《荒书》等)记载，张献忠曾有三次往返梓潼，他冒张亚子后裔而修庙一事，与梓潼县民塑张献忠像有密切关联。

张献忠首次往来于梓潼县域，是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秋。费密《荒书》记载，这年十月，张献忠、罗汝才自汉中入川，攻陷梓潼县城，并在梓潼七曲山设伏，击败了尾追而来的明军郭副将部。大概感到前有四川明军阻截，后有陕西明军追击，形势不利，故张献忠军从梓潼退兵。其中一部与广元追击至此的明军总兵方安国部在梓潼遭遇，明军先胜后败，被张献忠军的主力“追官兵至梓潼灵阳庙”，夺回被明军俘获的老弱，才又从剑阁、广元返回汉中¹¹。张献忠此次入川作战，与梓潼七曲山文昌宫关系密切，开始是在七曲山设伏，后来追击明军至文昌宫而止(“梓潼灵阳庙”应为梓潼灵应庙之误，也就是文昌宫的又名)，这为以后张献忠与张亚子联宗和修文昌宫埋下了伏笔。不过，张献忠这次入川是试探性的流动作战，还没有在四川建立政权，故不大可能发生认文昌为祖且重修文昌宫之事。

张献忠第二次可能进入梓潼，是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秋。这年张献忠从夔门入川，先后攻占了重庆和成都，于当年八月十五日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随后因李自成部马科也从陕西汉中南下，与张献忠争夺四川。马科在绵阳打败了张献忠部将张能奇，张献忠亲自率军出征把马科

〔图四〕“除毁贼像碑记”铭文拓片



¹¹ (清)费密《荒书》记载：“十月，张献忠、罗汝才自汉中犯成都，汝才号曹操，共献忠相犄角者也。贼陷梓潼县，副将郭某追贼至剑州武连探贼，而遇贼谍，给言贼已过绵州。贼仍伏梓潼七曲山后，官兵追至上亭铺，贼出邀击，官兵败，郭副将奔剑州会口，贼复入梓潼。总兵方安国自广元追贼至梓潼……贼走梓潼百顷，方饭，官兵追至。贼已去大半，官兵追杀贼五六百人，虏老弱贼数百人，杀罗汝才之弟。献忠已去，复返，追官兵至梓潼灵阳庙，夺老弱，走剑阁，从广元入汉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逐出四川¹³”。这次张献忠在川北作战，尽管其具体作战地域不是很清楚，但从“献忠自将与科战，科败，以残卒千余人由剑阁奔汉中府，献忠还成都”的记载看，张献忠应该是在绵阳至梓潼地域击败马科的，梓潼北面紧邻剑阁，所以文献才说马科从剑阁逃返汉中。由于张献忠这次川北作战是被动的防御性战役，作战地域的北部边界也不确切，他是否曾经过梓潼七曲山不得而知。所以，他也不可能在这次被动的军事行动中去大修七曲山文昌宫。

张献忠第三次往返于梓潼，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冬。这年十月，张献忠趁战胜李自成马科部之机，派遣部将张定国(他书也作孙可望)从川陕驿道复线，也就是潼川府(今四川三台)至保宁府(今四川阆中)的路线，往攻陕西汉中。张献忠则率主力从川陕驿道正线，从绵州(今四川绵阳)过梓潼、剑阁至广元，与张定国部相呼应。张定国攻占保宁后，十一月又占据汉中，在汉中北面的褒城鸡头关与李自成部猛将贺珍相遇，被贺击败，退回保宁。张献忠与李自成争夺陕西汉中的作战失利，只好从广元退回成都¹⁴。这次张献忠在广元驻扎的时间接近两个月，所率人马也只是策应张定国在陕西汉中的作战，军情不是很紧急，这时的他往返于成都与广元间路过梓潼，与张亚子联宗并重修七曲山文昌宫，是最有可能的。

关于张献忠在明末最后一年与张亚子联宗并祭祀七曲山文昌宫一事，他书也有明确的记载。清人李天根辑《燭火录》卷七记，甲申(1644)冬十二月十二日，“张献忠谋自蜀入秦，伪平东将军孙可望破李闯伪将马爌于汉中，自谓秦陇可唾手而得。自成乃以贺珍易马爌，趣之进兵。可望与战，大败。献忠自往救之，疾驰至广元，过梓潼之七曲山，见文昌庙，仰视其题曰：‘此姓张，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¹⁵。实际上，张献忠先前已经不止一次路过七曲山文昌宫，他早就应知道文昌帝君俗姓张，只是他这次已经成了大西皇帝，军务也不似先前那样紧急，还带上一帮文人随军，所以才有兴致尊文昌帝君为祖，并且重修文昌宫。

张献忠大修七曲山文昌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张献忠籍贯是陕西，山陕一带素有崇奉关圣帝君的传统，张献忠又与文昌帝君张亚子同姓，既崇拜关帝又崇奉文昌，正好文武相配，这也是张献忠在七曲山文昌宫修建关帝庙的原因¹⁶。另一个原因是，张献忠带领的军队首次入川时，曾经在梓潼七曲山两次击败明军的围追堵截，他将这些胜利与文昌帝君的冥佑联系起来，在自命为大西皇帝后，就开

〈1〉 前揭《荒书》记载：“十五日，贼张献忠僭位，改贼国曰大西，贼元曰大顺。……逆贼李自成亦遣贼将军马科以兵五千入川。……八月陷顺庆，遂至绵州。九月，献忠遣贼将张能奇与马科战绵之桃子园，能奇败。献忠自将与科战，科败，以残卒千余人由剑阁奔汉中府，献忠还成都。”

〈2〉 前揭《荒书》记载：“张定国十月遂陷保宁，十一月往攻汉中，献忠驻广元应之。……定国败，走还保宁。献忠还成都，留张文秀守广元。”

〈3〉 (清)李天根编撰：《燭火录》上册，页374-375，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4〉 (清)彭遵泗：《蜀碧》卷三记载：“贼所过处，公廨、民居、园林、亭馆、寺观、楼阁，悉为瓦砾，所存者惟文昌、关帝二祠。盖关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则彼推尊为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庙，又建关帝祠于东，皆极巨丽。”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第2册，页45，巴蜀书社，2000年。

始尊祖文昌，并大修文昌宫。

〔图五〕风洞楼新塑张献忠像

二 风洞楼张献忠塑像出现的时间

《除毁贼像碑记》述及七曲山文昌宫张献忠塑像来由时说，献忠“僭冒神族，而不敢杀左右民。民畏而媚之，塑贼于兹，妄亦甚矣。……复谬为之说曰：此即文昌化像也”。尽管这里没有说七曲山张献忠像是何时所塑，却隐约透露该像塑于张献忠生前。“民畏而媚之”，故塑造其像。与安洪德《除毁贼像碑记》同时且彼此关联的，王成彦《毁张献忠遗像记》也有“明季，梓潼人慑于逆贼张献忠威，肖其像于风洞楼，享祀不衰”的记载，更给人以张献忠像塑于其生前的印象。

关于七曲山文昌宫张献忠塑像的塑造时间，当今学术界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地文史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张献忠有恩德于梓潼，“张献忠之死，川民德之；立像于梓潼县北七曲山风洞楼上，绿袍金脸，香火不绝者几百年”^①。也就是说，张献忠像塑于张献忠死后。另一种意见以四川文史馆的冯广宏先生为代表，认为“梓潼贾、裴二姓获得免死牌，完全沾了张献忠梦中那位“宗弟”的光。为了报恩，赶快塑张献忠的像”。也就是说张献忠像塑于他还在世之时，有建生祠的性质^②。以上两种说法，笔者有保留地赞同第一种说法，即张献忠像建于他死后不久。理由如下。

首先，张献忠与文昌帝君联宗并大修七曲山文昌宫，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尊祖文昌，铸文昌铁像；二是赋诗颂德，立碑山顶；三是兴建关庙，文武相配。并未见张献忠时曾经在七曲山文昌宫（也就是他所称的“天圣神祠”）给自己塑像的记载^③。在大西政权存在的那一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至清顺治二年（1645）十月，张献忠常驻川北，包括梓潼在内的四川广元以南地区都在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控制下。这时正是张献忠大修七曲山文昌宫的时候，梓潼人士如果这时给张献忠塑像，应该在文献中留下痕迹。

其次是张献忠追尊文昌为祖，自己为文昌裔孙，大修七曲山文昌宫，命之为“天圣神祠”，也就是张氏大西的祖庙或太庙。清人《小腆纪年附考》卷八清世祖顺治元年十一月记载，张献忠自成都北救孙可



① 详见“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政府再塑张献忠像碑记”，1987年立碑。

② 冯广宏：《人心向背问张营——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六》，《文史知识》2010年第5期。

③ 据（清）查继佐《罪惟录》记载，“（张献忠）自以为张仲之后。时有将方甲以兵勒战，献忠祝曰：‘吾战胜，大张仲宇。’已战果胜。于是发银五万两，夫数千，重立梓潼庙，金碧极丽，伪勒为‘天圣神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望，“过梓潼之七曲山，见文昌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献忠不知书，其伪官进谏，比于李唐之追王混元，谓文昌之后宜巴蜀，诳耀百姓，建太庙于山，铸像祀之。落成赋诗，自严锡命以下皆有《恭和御制诗》，刻石纪焉”¹。七曲山文昌宫既然被张献忠当作祖庙“太庙”，他还在世上是不能在庙中给自己塑像作为祭祀对象的。

再次，风洞楼是张献忠重修七曲山文昌宫前就已经存在的建筑，明人游记中已经有关于风洞楼的描写。风洞楼位于文昌正殿与家庆堂之间，在朝拜或游览文昌宫路线的一个拐角上。尤其是张献忠塑像所在的风洞楼二层，比较隐蔽，要从楼后面的平台通过后门进入二楼，与通常的殿堂入口方向相反。在这样一个相对隐蔽的场所塑造张献忠像，不应该在张献忠生前，而应该在张献忠死后至张献忠余孽消灭之间最为合理。如果在张献忠生前的那一年，也就是追尊文昌和重修祠庙的那段时间，给张献忠本人塑像，就应该在很显眼的地方，而不该藏在这个角落里。

最后，赞助并主持塑造这尊张献忠像的人，不是普通的梓潼县民众，而应是直接受到张献忠恩惠的梓潼贾、裴二姓，尤其是这两姓中入七曲山文昌宫职事道士的人员。清人刘景伯曾经向梓潼县人询问过这些情况，梓潼人告诉他“献屠梓，惟贾、裴二姓不杀，命司香火。故贾、裴二姓世为道士报神恩，并塑贼像于殿内。事平，邑令毁之”²。张献忠之所以命贾、裴二姓为司香火，是因为这二姓就居住在七曲山一带。张献忠对他们不仅有不杀之恩，还曾“发银五万两，夫数千”，资助重修工程，他们自然有感恩戴德之心，因而才给张献忠塑像。由于张献忠对绝大多数川人来说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因而他们给张献忠塑像也不敢大张旗鼓，这也是被毁前的张献忠像是塑在风洞楼内的原因。

裴、贾二姓被张献忠命为司香火后，在大庙塑张献忠像，并以大庙香火为家族盈利，这引起了当地道俗和官员的不满，所以清嘉庆十二年(1807)，才有官府告示禁止裴、贾二姓进入七曲山文昌宫一事的发生³。

三 蜀道“咽喉匪类”问题

《除毁贼像碑记》云：“余奉上宪之委，协平梓潼道路……无怪乎年年咽喉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这段碑文言及当时两个社会现象，一个是梓潼的“咽喉匪类”以七曲山文昌宫为聚会场所，利用庙会聚集之机，祭祀献忠，以求佑护；另一个是当时梓潼川陕驿路并不安宁，可能不时有抢夺行旅的现象发生，朝廷才会派遣安洪德到梓潼，协助巡查蜀道，捉拿抢劫行旅的

¹ (清)徐鼐：《小腆纪年附考》上册，页288，中华书局，2010年。

² (清)刘景伯：《蜀龟鉴》卷三，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第2册，页157，巴蜀书社，2000年。

³ (清)吉士璜：《勒制宪禁裴、贾二姓入庙示》，前揭《重修梓潼县志》，页462—464，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咸丰八年刻本影印。

“啮嚙匪类”。

“啮嚙”是清代四川人对匪徒的称呼。当时号为清城子的文人所撰《亦复如是》一书说：“啮嚙，匪徒也，四川有之，劫人财物，亦犹闽、粤之有洋盗。”¹这些被称作“啮嚙”的无业游民，在清乾隆以前的四川地区极少见。四川在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争中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无主耕地，清朝政府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措施后，外省来到四川的移民有大量无主耕地可占可种，基本不存在无业游民。到了雍正时期，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全国各地的人口猛增，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显现。当外省的人们通过不同途径得知四川有大量无主荒地、先前移往四川的同乡好友已拥有了不少土地的消息后，就成群结队前往四川。这时，四川原先的无主耕地已被先前的移民所占据，较晚进入四川的移民群体已无现成的田地可以耕种，其中一些人就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整日习拳弄棒，惹事生非，甚至成群结伙，抢劫掠夺，危害地方²。乾隆初年，“啮嚙”已经成为四川的严重社会问题，一些官员开始上奏朝廷，希望采取措施，杜绝“啮嚙”危害³。安洪德从绵竹借调到梓潼巡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除毁贼像碑记》的时间是清乾隆七年(1742)，正是四川“啮嚙”危害趋于严重的年代。查《清实录》等文献，四川官员有关“啮嚙”的奏报始于乾隆四年，以后乾隆八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三十七年都有关于“啮嚙”为乱的奏报。清朝当地官员经过多年整肃，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乾隆十二年(1747)清廷用兵大小金川以后，四川内外军队都调往金川，无暇顾及小打小闹的“啮嚙”，故“啮嚙”匪患一直难以消除。大小金川之役旷日持久，加上前后两次战役之间的七八年，前后持续了近三十年，四川军民皆因金川战事而疲于奔命，“啮嚙”匪类也越来越多，影响到战线后方的稳定。因而才有官员安排部分“啮嚙”作为“运丁”，并为金川之役后勤运输提供服务，使这些无业游民有事可做而不致生事。《清史稿》卷三三六《顾光旭传》：“(乾隆)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文绶调四川总督，疏请光旭随往，司三路馈饷，署按察使。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为啮嚙子，至是益众。严捕治之，改悔者发为运丁，颇收其用。”关于“啮嚙”问题，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做过专门研究，此不赘言⁴。

1. (清)清城子：《亦复如是》卷三“啮嚙”条，页88—89，重庆出版社，2005年。

2. 《清实录》卷二〇三《高宗纯皇帝实录》：“再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土可辟，嗣后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与印照，使彼此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得旨：‘所见甚是，妥协为之。’”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

3. 《清实录》卷一〇三《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年)又奏川省恶棍，名为啮嚙子。结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夜间窃劫。现谕文武官，设法严拏。并稽查保甲，整饬塘汛，以靖奸匪。得旨：‘知道了。实力奉行，以期宁谧地方，毋徒视为虚文而已。’”《清实录》卷二〇三《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八年)四川巡抚纪山奏：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啮嚙子。奸淫劫掠，无所不为。其聚集多在州县交界处，所出没各有记认。羽党日多，捕役乡保，或一禀报查拏，必致遭其惨毒，为害实甚。现在多张告示，许其自首减罪，以散党与。并令自首之人，开呈同类姓名，记档存案。一面相机查拏究处。至此等啮嚙，凶恶异常。应请将著名巨魁拏获到案，即照光棍例治罪，或枷杖立毙，以其罪名揭示乡镇集场。其胁从者照律饬审。如系外来流棍，递回原籍，永远不许出境。如系本省奸民，责令乡保管束，朔望点名稽查。乡地齐心协拏者加以重赏，坐视放纵者示以重惩。地方官设法擒拏者特疏保荐，优柔不振者据实纠参。”

4. 胡昭曦：《“啮嚙”考析》，载氏著《巴蜀历史文化论集》页202—218，巴蜀书社，2002年。

通过梓潼县的川陕驿路主道，是山陕移民进入四川的主要通道，沿线的无业游民数量较多。这条驿道也是四川与中心地区联系的主要纽带，商旅往返于这条道路上，很容易吸引“啮嚙”匪徒的关注。从梓潼县的七曲山上山，一直到剑阁县的武连驿，这35公里的川陕驿路都在剑门山的余脉上，沿线山路逶迤，树木葱茏，聚落稀少，有利于匪徒隐藏。七曲山文昌宫又是这一带少有的位于山上的大型庙宇，祠庙内殿宇众多，平日里只有贾、裴二姓的几个“火居道士”，匪类躲藏于祠庙中，既可以遮蔽风雨，还可以躲避巡查。《除毁贼像碑记》所记梓潼川陕驿路不宁，“啮嚙”相聚七曲山文昌宫谋划作恶，安洪德奉命协查梓潼县域的官道沿线，并亲入七曲山文昌宫逐个殿宇搜查，“搜至风洞楼上”，就是为了捉拿隐藏在祠庙中的“啮嚙”匪类。当时四川交通要道沿线的治安，由此可见一斑。

四 安洪德毁张献忠像事

《除毁贼像碑记》记载，安洪德在文昌宫风洞楼发现张献忠塑像后，除了认为将贼像置于文昌宫是对文昌神的“大不敬”外，还将川陕驿道梓潼段“道之甚不平者”归咎于张献忠像的存在，故随后不久，即“命役万段其像，以正贼大逆不道，毒害生民之罪”。这是继清康熙时期梓潼县令王维坤捣毁张献忠诗碑后，清地方政府又一次清除七曲山文昌宫内张献忠遗迹的行动，值得关注。

张献忠在梓潼七曲山文昌宫留下的遗迹至少有四处：一是文昌帝君的铁像，二是关帝庙建筑和塑像，三是天尊殿前的张献忠及其群臣赋诗石碑，此外就是张献忠死后当地人塑造的泥像。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都是宋代以后普遍尊崇的神祇，尽管这些建筑和像设是张献忠赞助营造，清朝当地的官员也不会毁掉这些建筑和像设。不过，如果建筑或像设上有张献忠大西政权字样的，入清以后的当地官员还是要设法去除。

根据文献记载，张献忠在七曲山“建太庙于山，铸像祀之”。然而今文昌宫正殿的九尊铁像，都是“四川龙安府平武县江口村‘信吏’任宪及妻冯氏、子任寅东、任家灿一家捐献，铸造时间为明崇祯元年(1628)三月十五日”。后殿即桂香殿内，有一主二从三尊铁像，像身却无通常铜铁像常见的铭文。殿内两侧有铸铁花瓶上插镂空花束一式两个以及铸铁五足鼎一对。鼎虽残缺各断两足，但就残足的一只上依稀可见“大宋淳祐”字样^①。笔者怀疑，后殿的文昌大像就是张献忠所铸，而被清人磨去了铭文。至于文昌宫内与传统宗教崇拜无关的张献忠遗存，清政府的官员就没有什么顾忌，自然要毁之而后快。

首先被毁掉的是天尊殿前八卦亭内的张献忠题诗碑以及属下和诗碑，这些石碑罗列在七曲山最高处的殿前庭院内，具有纪念性且非常醒目，自然会被清廷当地官员首先注意到并毁掉。清康熙八年至十八年任梓潼知县的王维坤(参见《重修梓潼县志》卷三《职官》)，就带人砸毁了七曲山文昌宫张献忠题诗碑以及群臣和诗碑。清王士禛《陇蜀余闻》记载：“献贼乱蜀……重修七曲山神祠……献贼尝赋诗于此，使其

① 谢焕智、高文：《梓潼七曲山大庙铁铸文昌的断代及文化内涵》，《四川文物》2000年第4期。

伪官属严锡命等皆和，立成，稍迟辄杀之。其诗刻石，置祠八卦亭，知县王维坤碎之。”现在天尊殿前的八卦亭已经不存，但亭子的台基还在，一些碑刻的碑座还可辨识。

稍晚毁掉的才是张献忠的塑像，这也是有原因的。张献忠塑像位于风洞楼二层，该楼体量本来不大，二层还要从后面平台登临。并且该层除正面辟窗外，其余三面都封以厚墙，后墙只有一个不很大的门洞，安装两扇很普通的板门，一般香客或游客不会注意风洞楼二层，也不会产生要登临风洞楼的想法。即使有人偶尔进入风洞楼二层看到张献忠塑像，如果没人指点，也不能辨识该像就是张献忠。大概正是这样原因，知道风洞楼有张献忠塑像的人可能并不多，这使得康熙时梓潼县令王维坤捣毁张献忠相关碑刻时，没有注意到风洞楼上这尊塑像，张献忠塑像才得以保存到乾隆时期。直到绵竹县令安洪德进入七曲山文昌宫，搜查藏匿在庙中的“咽喉”，搜至风洞楼上看到这尊“绿袍金脸”神像时，联想到先前从罗江县令李德瀚处听到的该庙有绿袍金脸张献忠像的说法，才坐实该像即张献忠塑像，随后捣毁了这座塑像。

清王成彦《毁张献忠遗像记》记述了安洪德这次毁像的背景和过程，可以与安洪德本人的《除毁贼像碑记》相互印证。“明季，梓潼人慑于逆贼张献忠威，肖其像于风洞楼，享祀不衰。绵邑贤侯安公，今夏出梓潼道中，见逆贼遗像，骂之曰：‘此狗彘不食之余也，而人犹畏至而且神之，贼安得如是！’命左右磔之，陈于道。”^①看来，张献忠像应该是泥土的塑像，故安洪德捣毁其像后，还将像的泥土块焚烧，撒在文昌宫门前的川陕驿道上，“使往来乘畜践而溺之”，以发泄对张献忠的忿恨。

最后还需要对《除毁贼像碑记》中的一个矛盾现象作出解释。碑记落款中的安洪德“署直隶绵州知州”，其时在清乾隆七年(1742)，这时的梓潼县在十五年前就已归属绵州^②。作为绵竹县令的安洪德，为何在绵州属县梓潼巡查蜀道，只是“奉上宪之委，协平梓潼道路”？为何当他想捣毁梓潼七曲山文昌宫内张献忠像时，还要“明于本州宪杜兰”，自己不能做主？笔者推测，安洪德巡查梓潼沿线并捣毁张献忠像时，还只是绵竹县令，没有被正式任命为绵州知州，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像与他立碑记此事之间，应该还有一个时间距离。

张献忠及其部众长于流动作战，攻城略地而不占有，破坏性较强，不会留下什么物质遗存。四川盆地是张献忠曾经建立大西政权的地区，但因为处在战乱之中，遗留下来的属于张献忠及大西政权时期的文物极少。除了四川广汉县的张献忠圣旨碑外，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是保留张献忠及大西政权遗存最多的地点。七曲山文昌宫内包括《除毁贼像碑记》在内的与张献忠相关的文物，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特约编辑：郑 彤)

① (清)王成彦：《毁张献忠遗像记》，前揭《重修梓潼县志》，页449—451。

② 梓潼县，清初延续明代政区地理，属于保宁府，雍正五年(1727)改属绵州。参见任乃强、任新建：《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页73，巴蜀书社，2002年。